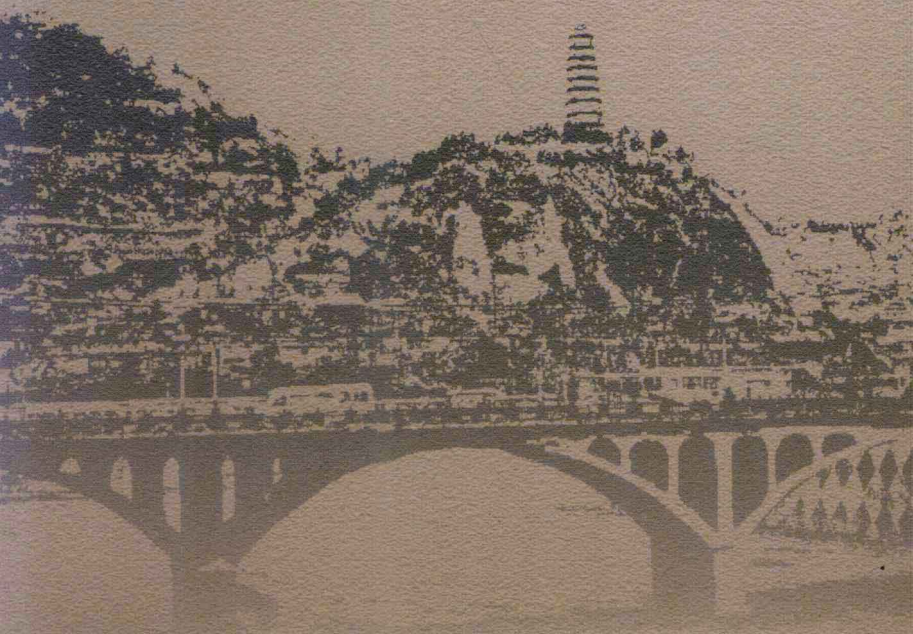


延安整风与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试用本)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编



延安整风 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编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材编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 张保庆

副主任 杨士秋

委 员	张保庆	杨士秋	王晓安	陈存根
	白阿莹	郭春和	杨军发	付建成
	郑永强	王中新	薛引娥	胡致本
	余华清	刘国元	刘 敏	王禄林
	王振亚	梁星亮	高尚斌	

内容提要

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的现实需要和基本条件。延安时期，党根据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明确提出了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延安整风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主要形式。党以思想建设为重点，以学风建设为灵魂，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实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创新。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党员思想素质、党驾驭中国革命全局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最终形成。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新时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党的建设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目 录

一、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争取革命胜利的现实需要	(1)
(一)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1)
(二) 创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	(5)
(三) 党所处的环境和党的构成需要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	(12)
(四)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任务的提出	(17)
二、延安整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伟大实践	(25)
(一) 延安整风运动的酝酿：“学习运动”的开展	(25)
(二)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高级干部开展整风	(29)
(三) 延安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全党普遍整风	(36)
(四) 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高级干部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50)
(五) 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	(60)
三、延安整风对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作用	(67)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67)
(二) 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71)
(三) 提高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培养了一大批党的骨	

干力量	(81)
(四) 大大激活了党的创造性, 提高了党驾驭中国革命全局的能力	(88)
(五) 培育并形成了党的三大作风, 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现创造了基本条件	(95)
四、延安整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启示	(104)
(一) 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	(104)
(二) 必须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 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	(106)
(三) 党的建设应把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	(108)
(四) 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方法	(109)
(五) 党的建设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 在形式和方 法上不断创新	(111)
后 记	(115)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时期。在中共中央到达延安的第四个年头，即193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个党的建设上的重大举措，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豪迈地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个大手笔，它同过去18年党的历史相比，在党的建设上更具有针对性、计划性、整体性和根本性。在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过程中，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伟大实践，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今天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争取革命胜利的现实需要

延安时期，党提出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

（一）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毛泽东曾经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革命，抗日战争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中国对付凶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一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向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向指导战争的领导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②。同样，抗日战争“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③。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勇敢地承担起了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也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但这种领导也不是天然的，要担负起领导的重任，就必须首先把党自身建设好。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他还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①，“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和宗派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②。一句话，伟大的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共产党人成为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因此，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整体素质和领导能力，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复杂的斗争，对党的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建立和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条件。但统一战线内部充满着斗争，中国共产党面临一系列复杂而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复杂得多。现在是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①。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因此，在党内既要防止犯“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又要防止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要尽可能保持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争取继续抗日、团结和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②，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具备应对复杂环境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双重任务，清醒地认识当前与未来，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重要的任务。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一再告诫共产党员，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引导到人民的胜利，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时阶段的任像与共产党员奋斗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承担着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且承担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即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和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毛泽东要求“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奋斗，绝不能半途而废”^①。并指出，只有认清两个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实现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建设一个伟大的党。“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②

总之，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建设。

（二）创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

1. 创立科学的思想路线，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但马克思主义为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并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方案。中国革命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这些特点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结出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因此，创立科学的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初步在实践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但是，对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还是初步的，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党在斗争的实践中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继续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对中国革命也给予了许多错误的指导，这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的错误。第一次是从1927年八七会议至1928年4月下旬的“左”倾盲动错误。第

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期间发生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三次“左”倾错误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危害最大，使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和根源，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导致的。这种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出发，从认识方法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初步揭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思想，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号召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

^① 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求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①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和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创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实现的根本途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冲破教条主义“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中，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中国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跨越。

2. 用科学的思想路线武装全党，是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这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中央高层的初步确立。

但是，也应看到，遵义会议后由于党的高层领导的变化引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起的党在思想路线上的重大改变仍是初步的。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又发生了一次波折，这一波折反映出在全党范围内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是党面临的严重任务。

抗战初期党内发生的这次波折是由王明回国引起的。1937年11月，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回国后，推行了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的、以右倾为特征的抗战主张。王明回国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内的倾向作了正确的分析。11月12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他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①

而王明回国后，脱离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忘记第一次大革命以来党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他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轻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忽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主张“一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392页。

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的军队求得速胜。王明的右倾错误，其根源在于唯上，完全听命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临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处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其实，法共的这个经验并不是成功的经验，如果中国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立场，处处迁就资产阶级，实际上只能使无产阶级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让统一战线的命运听凭资产阶级去摆布，最后必然导致失败。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把他的错误主张说成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一段时间内使一些党内同志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谈到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提出的右倾观点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

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①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到王明回国时的状况：“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② “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③ 毛泽东后来分析王明错误主张的根源时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④ 不从中国实际问题考虑，唯书，唯上，这就是王明教条主义的重要根源。王明的这些右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害。

党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实现的。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前夕，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②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页。

③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页。

④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页。